

热历史

历史上的报恩故事

中国没有感恩节,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感恩、报恩一直被人所提倡,一些关于报恩的历史人物也一直被人们所铭记。

春秋时期晋文公:
许诺作战时退避三舍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春秋时候,晋献公听信谗言,杀了太子申生,又派人捉拿申生的弟弟重耳。重耳闻讯,逃出了晋国,在外流亡十几年。经过千辛万苦,重耳来到楚国。一天,楚王设宴招待重耳,两人饮酒叙话,气氛十分融洽。忽然楚王问重耳:“你若有一天回晋国当上国君,该怎么报答我呢?”重耳略一思索说:“美女侍从、珍宝丝绸,大王您有的是,珍禽羽毛、象牙兽皮,更是楚地的盛产,晋国哪有什么珍奇物品献给大王呢?”楚王说:“公子过谦了。话虽然这么说,可总该对我有所表示吧?”重耳笑笑回答道:“要是托您的福,真能回国当政的话,我愿与贵国友好。假如有一天,晋楚之间发生战争,我一定命令军队先退避三舍(一舍等于30里),如果还不能得到您的原谅,我再与您交战。”4年后,重耳真的回到晋国当了国君,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晋文公。

公元前633年,楚国和晋国的军队在作战时相遇。晋文公为了实现他许下的诺言,下令军队后退90里,驻扎在城濮。楚军见晋军后退,以为对方害怕了,马上追击。晋军利用楚军骄傲轻敌的弱点,集中兵力,大破楚军,取得了城濮之战的胜利。

战国时期如姬:
助信陵君窃符救赵

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很多人都听说过,但是故事中有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却常常被人忘记,那就是当时魏王的宠姬如姬。当年如姬为求报父仇3年而不得,魏王也毫无办法,就求到信陵君。信陵君果然为她报了父仇,如姬感激涕零。后来信陵君为救赵之事苦恼,欲夺晋鄙兵权的时候,信陵君的一个门客想起这件事。史书上是这么记载的:侯生乃屏人间语,曰:“嬴闻晋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窃之。嬴闻如姬父为人所杀,如姬资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报其父仇,莫能得。如姬为公子泣,公子使客斩其仇头,敬进如姬。如姬之欲为公子死,无所辞,顾未有路耳。公子诚一开口请如姬,如姬必许诺,则得虎符夺晋鄙军,北救赵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从其计,请如姬。如姬果盗晋鄙兵符与公子。”

“如姬果盗晋鄙兵符与公子。”短短11个字,就把这段惊心动魄的故事掩去了。史书上对这个女子的记载似乎就此为止了。她的命运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窃符救赵后信陵君10年不敢归国,由此可见,恐怕如姬性命也难保全的。

三国时期臧洪:
天下首屈一指的义士

《三国志·魏书7》中记载了两个人,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吕布,另一个是籍籍无名的臧洪。臧洪少有才名,中平末年辞官回家,被广陵太守张超聘为功曹,在酸枣之盟共讨董卓中,臧洪更是作为上坛领誓之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当时,张超留在了陈留,派臧洪前往幽州联络大司马刘虞。臧洪到达河间国时,恰逢袁绍与公孙瓒交战,臧洪无法通过,恰好袁绍在那里。这时青州刺史焦和病卒,袁绍任命臧洪为青州刺史。在臧洪的治理下,青州呈现出新的面貌,“群盗奔走”。袁绍改任他为兖州刺史部的东郡太守。

公元195年,曹操在雍丘包围张超。张超对部下说道:“这种情况下,也许就臧洪会来救我吧。”部下

生活史

蒸花馍

▲永济博物馆民俗规划展展出的花馍

记者 刘亚 摄

花馍是广泛流传于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地的一种民俗艺术品,流传了千余年。花馍可赏、可吃,2008年已经被国家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旧时的农村,过春节要蒸大馒头、枣花馍、元宝馍、布袋馍;元宵节要做羊、狗、猪、鸡类的花馍送给小孩;清明节、乞巧节、中秋节,婚丧嫁娶、祭奠祖先、老人过寿、小孩满月,但凡您想得起来的中国节日,都有它的俏模样。

会做花馍的人,被人称为“巧儿”,别看人家没纸没笔没进过绘画班,做的花馍一样活色生香、美得不要不要的。

做花馍需要在头一天晚上把酵子发上,等到第二天早上,早早起来用温水加面,再加一点食用碱面开始制作。发酵好的面,通过揉、捏、揪、压、搓、按等手法,借助剪刀、梳子、筷子等剪、切、挑、拨、刻,再用花椒籽、红豆、绿豆、大枣等加以装饰,制作成花馍的雏形,然后上锅蒸熟,涂上各种可食用的颜料,一个个五颜六色、造型各异、形象生动的手工大花馍就好啦!

花馍上的五彩缤纷,能不能吃?答曰:能。那都是食物颜料,都是从食物果蔬中提取出来的。有了它们,金黄的刺猬、白胖的小猪、枣花馍、寿桃馍、龙凤呈祥、锦上添花、五福拜寿……当初软塌塌、不起眼的馍料,进蒸笼一过堂,出来立刻神采飞扬,成了众人眼前的焦点!

(《新民晚报》)

文史小考

符牌、牙牌与腰牌

先说符牌。符牌最早是兵权及君权的象征。珍圭与牙璋都是符牌的一种。秦汉以降,符牌的形制衍生出节、虎符、竹使符等门类。苏武持节出使匈奴,所持的节正是这种符牌,大致为一根长八尺的竹竿,其上装饰着旄羽,代表皇帝的身份。虎符与竹使符则多为兵符,从“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竹使符出入征发”等记载来看,两者一主发兵、一主征兵,均有通过“两相堪合”以防伪的功效。兵符多以虎形为主,后又有鱼符、龟符等形制——不过无论何种样式,这些符牌都与身份证的内涵相去甚远。

随着岁月的流逝,符牌渐渐与官员的身份有了交集。唐朝时,朝廷为了“明贵贱,应召命”,根据官员不同的品级发放金、银、铜制的鱼符,其中五品以上的官员还佩有专门的鱼袋。鱼符分左右,左符放在内廷,右符由持有人随身携带,需要时“两相堪合”,便能确定持有人的身份了。

到了明清时代,这种符牌渐渐褪去了唐宋的古韵,最终演变成牙牌与腰牌。明朝牙牌上除了朝臣的姓名和官职,有时还会刻上使用范围与禁令;清朝腰牌就更为完备,还加上了编号、年龄、相貌特征、发牌年代等,在形制上和后世的身份证已经大同小异。

即便如此,牙牌与腰牌也不宜被视为中国古代的身份证。这些符牌所证明的并不是某一个体的身份,而是某一阶层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牙牌、腰牌与朝臣的补服一样,首先代表着官员的等级地位,而防伪功能只是基于这种等级地位的自然延伸。手握符牌的人,不是“有身份证的人”,而是“有身份的人”。

(《检察日报》)

▲盐湖区博物馆展出的明代象牙腰牌

记者 刘亚 摄

史海钩沉

古代的交通管制

在很多朝代,不仅仅是皇帝出门要清道,官员出行也有讲究,有专人喝道鸣锣。《周礼》记载,周朝高官上街,即有吏役在队伍前面“掌执鞭以趋辟”。汉代以后,用鞭子的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喝道,也就是用嗓子喊。清代时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市面也越来越喧嚣,光靠嗓子很难让路人及时回避,于是就有了鸣锣。据载,鸣锣的次数与官职高低有关,州县官上街,仪仗鸣锣七下,谓之“打七棒锣”,意思是“军民人等齐闪开”;道府官上街则“打九棒锣”,意为“官吏军民人等齐闪开”;提督巡抚上街要“打十一棒锣”,意为“文武官员军民人等齐闪开”;若是都统以上官员上街,更是要“打十三棒锣”,意思是“大小文武官员军民人等齐闪开”。老百姓得把鸣锣次数的不同指代记住,听到声音就得自觉退让或跪拜。

“回避”和“肃静”这两块在影视剧中常见的牌子,当然也真实存在。明清时的官员仪仗,有对旗、对锣、对牌、对伞、对扇、金瓜、月斧、朝天钹。其中对牌上面就写有官阶名和“回避”“肃静”等。

帝王出行时的交通管制属于“高级别”,平日里则有严格系数相对较低的交通规则。目前陕西灵崖寺大殿左夏房有石刻的《仪制令》,上有4行小字:“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即古代的日常交通规则,意即一般平民百姓要给官员让路,年轻人给长者让路,轻装车要给载重车让路,出城的要给进城的让路。其中,“贱避贵”就是根据等级而定的回避制度。宋太祖赵匡胤曾规定,“大小官员相遇于途,官级悬殊者即行回避,次尊者领马侧立,稍尊者分路行”。明朝也有严格的“避轿制度”,凡官职低的官员乘轿出行,在路上碰到官职高的官员,一律都要停下轿来避到路边,官职低的官员本人还必须来到大街边上迎着上级官员的大轿挺身长跪,待官职高的官员过去,方可重新上路。官员尚且如此,老百姓更不用说。清朝规定,军民人等在街市上遇见官员经过,必须立即躲避,不许冲突,若有冲撞,将被治罪。

(《解放日报》)

有「回避」「肅靜」字样的对牌

记者 刘亚 摄

▲临猗县临晋县衙景区写